

杏坛行知录

王亦群 著

杏坛行知录

王亦群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杏坛行知录 / 王亦群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399-5834-7

I. ①杏… II. ①王… III. ①王亦群—回忆录 IV. ①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7412 号

书 名 杏坛行知录

著 者 王亦群

责任编辑 王宏波

文字编辑 王 伟

责任校对 张松寿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125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834-7

定 价 30.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张志强

说起来,我是王亦群老师这本回忆录的始作俑者。无论是我在南通工作还是离开家乡以后回南通去拜见王老师,听王老师聊天绝对是一件很过瘾的事。在南通工作时,每天中午大家到食堂吃饭,都喜欢跟王老师坐在一起,目的就是听王老师说过去的事情。我到南京大学后,就没有这个福分了。只有偶尔过年回南通向王老师拜年时,才能再听他说说过去的故事。我印象中最深的,就是常听王老师说,他小时候,听到电线在刮风下雨中呼呼的声音,老人便说,洋鬼子收了中国人的鬼魂,强迫他们送信,不分日夜地不给休息。这些鬼魂劳累不堪,阴雨天听到的呜呜声,就是鬼魂们哭泣时发出的。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这真是匪夷所思的事情。社会就这样进步着,而这些早已成为历史。而我们,对过去的历史并不是全都知道。于是,趁着王老师的记忆还好,我便怂恿他将自已的经历记载下来,目的便是给后人留下一些社会史的资料。怕王老师不愿接受这一建议,还搬出了他的老师朱东润先生。说,朱先生晚年写的《朱东润回忆录》,记载了许多有趣的事情,如果他不写,别人就不知道;您一辈子吃过不少苦、受过不少罪,对人生自有



别人不知的感悟，也应该将回忆录写出来。好在王老师接受了我的建议。老先生一笔一画写了一年多，草成了十多万字。其间承蒙王老师的高足吴媚女士打字录入，王老师又七易其稿，最终有了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书。

在我们的记忆中，王老师属于那种记忆极好、能出口成章的人。去年同学聚会时，特意把王老师请过来。大家聚到一起，看到王老师，首先想到的就是当年上古文课时，王老师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讲解。王老师的功底同样在书中也小有流露。早年，他到南通师范来教书，有人寻机试探他的水准，他轻巧应对；晚年他被推举出来编师范学校的语文课本，有人不服气，也暗中来考他的情况，他同样应对自如。这些小插曲，都有意无意说明了王老师的处世之道与学术根基。

王老师一生颇不顺利。他早年毕业于无锡国专，也曾走在仕途上。但终因他觉得自己不是从政的料而选择了学术。他的老师曾对他寄予厚望，曾预言他二十年后必扬名海内外；他的无锡国专同学中，后来也有人成了全国著名的学者，但他的学术之路却不那么平坦。随着他变成了右派和“五一六”分子，整个人生都改变了轨迹。他常常感慨地说，反右时，他最初是左派，但后来一下子变成了右派。世事就这么复杂，命运就如此无常。但王老师却很乐观。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他始终没有丢弃生活的信仰。下乡的过程中，他目睹了农村的贫困，所以每次跟他聊天，他总说要关注农民的生活。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城乡差距依然巨大；王老师的这种思绪，显然是知识分子忧国忧民情感的自然流露。

说起来，王老师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而我们中的大多数，也只是这个社会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我们构成了社会，社会也改造了我们。王老师的笔下，没有惊天动地的宏大叙事，有的只是他

个人的经历与感悟。他的回忆录,从一个普通百姓的角度,留下了七八十多年来历史变迁的记载。它不同于学院派的著述,只是从一个民间学者的立场,再现了七八十多年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六十多年的历程。书中对许多民间习俗的记载和分析,可使我们了解江苏乡村的日常生活及其演变,如:为什么当时开酒店饭馆会让人看不起;早年人死后入殓时敲棺钉,为什么死者为男性时敲最初三记的一定是族长,而为女性时敲最初三记的一定是舅父或他的儿子等。这些,在书中都有详细的分析。我希望这本回忆录,多年后能成为社会史专家研究中国二十世纪地方历史的一个参考读本。

十多年前看朱东润先生的《李方舟传》时,我曾信手写过一篇《朱东润与〈李方舟传〉》的短文,信口提到自己算起来该是朱东润先生的再传弟子。有朋友开玩笑,说我往自己脸上贴金。现在的这部“回忆录”,多处记载了王老师与朱东润先生的多年情谊,也算给了我一个小小的证明。因为受过朱东润先生的教诲,王老师始终对朱东润先生行弟子礼。他常常跟我说,他“文革”后去拜见朱先生,离开时向朱先生深鞠了一躬,走到路转弯处,回头看见老师仍旧站在门口,又深深鞠了一躬。去年去日本时,我要见日本上智大学的一位教授,便托我的朋友、他的博士生去约。那天饭后大家告辞时,我的朋友对着那位老师深深地鞠了一躬,一直等到她的老师走远了才直起腰来。在日本,这一躬,实属正常,因为表达的是对老师由衷的敬意与感恩;但对我,却是一种震动:因为我们已不再奉行鞠躬这一礼仪。这一躬,忽然也使我想到了王老师对朱先生的那一躬。

我在南通读书、工作前后长达九年,王老师给过我无数的帮助。我自己能有今天,也全赖王老师当年的提携。1989年秋,我准



备考南京大学的研究生,但当时正是“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时代,家人并不理解我的举动,认为我已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也颇受单位的器重,一旦易辙,未来将会变成未知数。自己内心也常常惶惑不已。去跟王老师聊天,王老师给了我坚定的支持,说人生需要不断进步。印象中特别深的是,1990年考研前夕的某天,王老师忽然带给我一盒茯苓饼,说是他在北京工作的早年学生来看他时带给他的。他希望我借这个彩头,也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我至今仍记着这盒茯苓饼,因为它曾是我一个极大的动力。其实不止我,我的许多在南通师范求过学的师弟师妹,也正是在王老师的鼓励下,先后考上了研究生。人生能有这样的好老师,是自己的幸运,也是国家的幸运。如今,我在课堂上,面对刚刚跨入校门的学生,常常提醒他们,你们四年大学的好坏,以及你们今后的人生,跟你们遇到的老师有关,一定要跟老师多联系多交流。这是我的人生经验,也是王老师给我的启迪。

在王老师回忆录出版之际,作为第一批读者之一,写上上面的这些话,以表达一个学生对老师的感激之情。同时更祝王老师身体健康,能在米茶之际,给他更多的祝福和问候。

2012年1月23日,农历正月初一

[作者系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科学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全国出版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目 录

序/张志强 >>>> 001

一 >>>> 001

二 >>>> 003

三 >>>> 009

四 >>>> 012

五 >>>> 017

六 >>>> 023

七 >>>> 028

八 >>>> 031

九 >>>> 035

十 >>>> 038

十一 >>>> 041

十二 >>>> 044

十三 >>>> 045

十四 >>>> 048

十五 >>>> 050

十六 >>>> 056

十七 >>>> 061

十八 >>>> 064

十九 >>>> 066

二十 >>>> 068

二十一 >>>> 070

二十二 >>>> 073

二十三 >>>> 079

二十四 >>>> 081

二十五 >>>> 083

二十六 >>>> 087

二十七 >>>> 089

二十八 >>>> 091

二十九 >>>> 094

三十 >>>> 097

三十一 >>>> 101

三十二 >>>> 105

三十三 >>> 111

三十四 >>> 117

三十五 >>> 123

三十六 >>> 125

三十七 >>> 127

三十八 >>> 130

三十九 >>> 134

四十 >>> 143

四十一 >>> 146

四十二 >>> 149

四十三 >>> 151

四十四 >>> 153

四十五 >>> 156

四十六 >>> 158

四十七 >>> 164

四十八 >>> 168

四十九 >>> 176

五十 >>> 179

五十一 >>> 185

五十二 >>> 189

五十三 >>> 194

五十四 >>> 201

五十五 >>> 208

五十六 >>> 214

五十七 >>> 217

五十八 >>> 222

五十九 >>> 224

六十 >>> 228

六十一 >>> 231

六十二 >>> 234

六十三 >>> 241

六十四 >>> 242

附录

我最难忘的人——忆王亦群老先生/阿东 >>> 244

话说王亦群老师/佚名 >>> 247

记王亦群先生/周录祥 >>> 249

1927年5月我出生在江苏姜堰。那时姜堰是扬州南通之间的一个镇，一直属泰州管辖。由于通扬运河从镇南流过，货运比较方便，因而这里商业尚称发达。我年幼时姜堰已用电灯，不久又通电报和电话，但用电灯和电报电话的人家极少。我家是普通地主家庭，父亲和几个伯父一道兼营绸布店和机器极其落后的纺织厂，竟全然没有想过用电灯和电报、电话的事。当时新式教育并未普及，全镇只有一所完小，一所初小，没有初中（荣汉初中是抗战初才由私人创办的），因而民智未开；交通更是落后，长期依靠木船或独轮小车载客、运货、传递信件。绝大多数人家都没有收音机，因而能得到的信息极少，直到抗战爆发后才通了汽车。全镇上下，从士绅到平民都还生活在陈旧的思想氛围中。

那时空中架设的电线，不知是由于器材落后，还是因为技术不过关，每逢刮风下雨，总会发出呜呜的响声。老年人听见便议论说：洋鬼子收了中国人的鬼魂，强迫他们送信，不分日夜都不给休息。这些鬼魂劳累不堪，逢到阴雨天听到的呜呜声，是鬼魂们哭泣时发出的。那时姜堰已有教堂，每逢信徒病危时，教职人员都去为他们做祈祷。不信教的人就怀疑是因教徒平时用了教会的钱，这时教会派人来收魂以供当差了。



这类话我当时听了并不在意。现在回想起来，问题出在世界急剧变化，西方的发展远远超过中国。1840年西方列强打破中国大门，而中国民智未开，特别是相对落后的姜堰民众，对小镇上出现的新事物无法理解，而不同人群间也未能相互沟通，于是对不理解的人和事便总是根据自己的想象往坏的方面猜测。所幸这类人为数不多，政治意识又淡薄，而且没有组织，便只是在闲谈中流露出不满与厌恶；而信教的人不多，其中更无有钱有势者，因而教会势单力薄，也不干预普通居民的多神教信仰和祖先崇拜，所以尚不至矛盾激化，闹出大事。清末教案不断，甚至引起义和团入京扶清灭洋，最终导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中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究其起因，既是西方列强的军事入侵，又是中西方两种文化、文明的冲突与对抗所致。

由于中国地域广阔，而在很长时间内交通又欠发达，同一阶级甚至同一家族的人对日常生活方式都会有不同见解，甚至发生冲突。至今我还记得一次我的大姑母到我家串门，看见我两个妹妹都没有裹小脚，就忍不住讥讽说，女孩一双大脚十分难看。我母亲听了十分生气，但看我父亲面上，勉强忍住未反驳。等我大姑母回家，我母亲就大发牢骚。但我母亲也是一双小脚，为什么不和大姑母同唱一个调？事后回想起来，是因为我母亲比大姑母年龄小了十多岁，认识就和年长十多岁的人有了差异。

1964年我母亲迁居南通。一次我陪她去医院看腿疼的疾病，医师为了方便检查，让她将鞋脱下。这时几个护士突然拥过来观看，开始我还以为她们是来看医师如何诊断如何治疗，不过很快从护士的交谈中听出是因为她们从未见过小脚，觉得稀奇。我便想起南通由于出了张謇，地方发展早于姜堰，女孩不裹小脚的时间比姜堰要早二三十年，所以当地人就觉得小脚稀罕了。

从这里我想起在无锡国专读书时，听安徽来的同学讲，和他们年龄相仿的年轻姑娘普遍裹了小脚。一家的男人到另一家去，距离还远就必须大声咳嗽，以便一双双小脚咚咚咚奔进房间躲起来。如果事先不咳嗽，冒失撞进去，这家的家长就会发脾气，大声说：“俺家有大闺女！”闯进来的冒失鬼就要赔礼道歉。



作者无锡国专读书时

安徽紧靠江苏，姜堰离南通更近，但在社会发展程度上就有这么大的差距，更别说距离遥远的地方了。

二

我这个家族是明朝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1483—1541)的同族弟弟王栋(1503—1581)的后代。根据记载，王艮、王栋的始祖王伯寿原住苏州，在明洪武年间根据诏令，被迫迁徙至泰州安丰场(今属江苏省盐城市下属的县级市东台)，成了灶户。灶户世代代煎煮海水成盐，然后按照规定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量的盐产品，另外还要负担政府摊派的杂役，劳动繁重，收入微薄，生活水平还不如贫苦农民。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什么要将王伯寿从可以和“上有天堂”类比的苏州迁徙到安丰场当灶户，从未听到祖辈、父辈提起过，估计他们也不知道。

近来有幸看到2009年第六版《辞海》，还读了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第十六章《王艮与泰州学派及其与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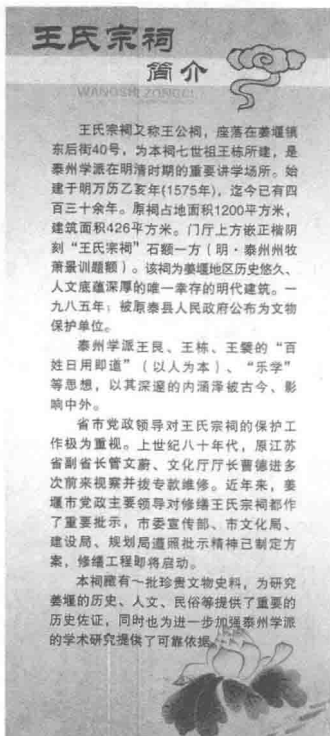
学(王阳明学说)的关系》，才初步了解到我这个家族的始祖王伯寿的子孙几代被迫烧盐是出于明王朝对食盐的需要。



根据《明会典·户部七》的记载，明初规定：“凡各处有司十年一造黄册，分豁上、中、下三等人，仍开军、民、灶、匠等级。”可见灶户不是普通平民，而是另成一类。灶丁是灶户中承担盐役的丁壮，从十五岁起至六十岁应役。灶丁承担制盐徭役，规定课额，有余，由官收购，不得私售。灶丁因长期受烟火熏灼，多失明。灶丁劳动的艰苦程度超过贫苦农民，自然有人想改行，但明政府明文规定：灶丁世代相传，非经申告获准，不得脱籍归民。灶丁由什么人来充当呢？灶丁的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来自所谓“罪情深重”的囚徒，二是朝廷“行有司签补”，即将平民充作灶户。根据王艮的长孙王之桓在《世系详注截略图》引言中所述，他们的始祖王伯寿在朱元璋洪武年间依诏令“自姑苏（今江苏苏州市）徙淮南安丰场”（《重镌心斋王先生全集》卷二）。王伯寿的儿子国祥即“占灶籍，煮海”（《世系详注截略图》）。直到王艮及其儿子们“俱系安丰场灶籍”（《世系详注截略图》）。除“应办盐课”外，还必须负担灶丁身份的杂役，王艮本人就曾“以身代役”，替他父亲去从事官府的徭役。

在明朝中期，两淮一带灶户有贫灶、富灶之分，而王艮的家庭属于贫苦灶户。因为家境贫寒，读不起书，王艮只好跟随父兄参加劳动，养家糊口。凌儒所撰王艮《祠堂记》中写道：“吾乡心斋王先生本农家子，生长灶间，年三十才可（“可”的词意是“大约”）识字。”

王艮能从一个贫苦的灶丁成为一个著名学派的创始人，绝不是一蹴而就的。王艮十九岁奉父命商游四方，到了山东曲阜，便立志要当新孔圣。王艮的得意门生徐樾为先生所作《别传》中写道：“（先生）既冠，商于山东，特谒孔庙，即叹曰：‘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他从此发愤自学，在“商游”过程中，读书碰到不理解的地方，



王氏宗祠简介



王氏宗祠

沿途向人请教。由于他是一个有才智、有抱负的人，他读书虽迟，读的书也不多，但体会到许多人生道理。听说江西巡抚王守仁有学问，便乘船前去请教，并最终拜王守仁为师。王艮出生在贫苦家庭，长辈没有文化，所以给他取名为“王银”，流露出了穷人想发财的心态。王守仁将他名字的偏旁“金”字删去，取《易·艮卦》之义，更名为王艮，字汝止，号心斋。王艮虽拜王守仁为师，但时时不满于师说，不过，两人并没有闹翻。

王艮开创的泰州学派，首先着眼于平民教育，提出“百姓日用即道”，强调尊身立本，爱己及人，特别重视广大下层群众，接受他

教育的包括种田的、砍柴的、制陶器的。

我的直系祖先是王艮的族弟王栋。王栋字隆吉，号一庵，从王艮受格物之旨。他曾做过教喻一类的小官，致仕归乡后，受聘海陵（古县名，西汉置。以其地傍海而又有高土山而得名，治今江苏省泰州市。）安定书院。其学重在发挥王艮“百姓日用”之学，反对克欲。提倡平民教育，颇得王艮学说之精意。

王艮成为泰州学派的创始人后，生活即以讲学为主，他的族弟王栋和儿子王襞(bì)继承了王艮的学说从事学术活动。随着来听讲学的人日益增多，泰州学派的影响遍及半个中国。黄宗羲在所著的《明儒学案》中，特辑《泰州学案》五卷予以论列，并以歌颂的笔调致钦敬之情。

至于王艮、王栋的子孙，以后大概就只当地主了。历代财产无法确知，大约都属中等偏下的地主。根据民国十五年修订的王氏宗谱中关于我曾祖的《崇业公传》的记载：“公讳朝福，字崇业，熙纯公（我的高祖）生五子，公其最幼者也。……生平仗义疏财，凡有赙卹，不择人而施。”从这篇传的记载，可以得知我的祖父郁哉公晚年捐出一生



王 艮



王 栋



王 襞

购置的田地的一大半办义庄是受到我曾祖的影响。可以确知的是我曾祖父有田三百亩，分给三个儿子，每人得一百亩。靠一百亩地收租是不能维持体面生活的，于是除收租外，他们还各自经商：大伯祖开钱庄；二伯祖起初贩卖绸布，赚了钱后便开南北货店；我祖父经营油坊。值得一提的是二伯祖最初没有在镇上开绸布店，而是将绸布背在肩上到乡间叫卖，从中可看出开始时本钱有限，同时当时姜堰很小，人口也少，富人更少，只好到农村地主家去兜售。后来两位伯祖先后早逝，只留下女儿而没有儿子。那时尚是清末，女儿只能陪嫁，不能分得田产，于是他们的遗产由我两个伯父继承。由于两个伯父年龄尚小，事实上全部财产便都归我祖父统一经营。

我祖父生活的那一时期正值姜堰及其周围人口增加，生产发展，购买力上升，加上我祖父十分精明，十分勤俭，家业日渐充实。当地人背后形容说我祖父早晚吃粥时，吃的菜是酱缸中腌的咸豆，为了节约，每粒豆都分三口吃。这未必是事实，但他日常生活的节约可想而知。靠了勤劳加节省，于是家道蒸蒸日上，除店铺增加外，还购买了不少田产。到他五十多岁时，已有粮田两千多亩，草田（专门长草以供牛羊食用）一千七百亩。大约由于劳累过度，我祖父开始经常昏眩，自己觉得活不长了，便决定趁自己活着时处理好这笔不菲的财产。可能因为在不断购置产业的过程中，亲眼目睹一些大户人家的子弟嫖赌吸毒，胡作非为，最终不得不出卖田地，甚至倾家荡产，便从中接受了教训，决定按照当年自己分得百亩的标准，每个儿子也各分给田地百亩（对两个过继给伯祖的伯父每人另加百亩），并告诫儿子：如有能耐，就像自己一样，以百亩为基础，不断发家；没能耐或不努力，有百亩地也能养家糊口，不愁吃穿。余下的粮田和草田，我祖父全部用来办了义庄，以供赡养族人



和举办地方慈善事业之用。财产处理好不久,我祖父突然中风,完全失去知觉,成了植物人。我祖母姓李,兄弟和侄辈中有几位以中医为业,但对祖父的高血压却无力治疗,直接可见至亲的医道平庸,间接可见那时至亲的整体交往不多,见闻不广。如果交往较多,见闻较广,他们就会到泰州去学习医术,提高自己。我祖父虽然还拖延了两三年,但生活已毫无质量可言了。在今天,血压可以测量,中风可以预防,可以治疗,但时间在民国初年,地点在姜堰小镇,只能一筹莫展。当时姜堰的落后可以想见。

从我祖父办了义庄开始,我父辈用为我祖母积德延寿的名义,又陆续出资添置田产。到1949年,义庄可支配的田产有三千七百亩(可能包括草田在内)。当地举办慈善事业,如冬季放粥、荒年发粮、资助育婴堂收养弃婴,每年义庄都捐出很大一笔钱。我的父辈大约觉得自己钱既出了,德便积了,天老爷自会降福消灾,对这类慈善事业便懒得参加管理,另行贡献力量。那时当地还有一些财产不多的地主,也想积德祈福,又觉得自己出钱有困难,便去参加管理,做义务工。如寒冬放粥时,他们便半夜起床,赶到作为放粥地点的庙宇,称出粮食,监督烧煮发放。为御寒,他们都是在自家吃好早饭或去面店自费吃面,从来不敢在大锅中喝一口米汤。这未必是于心不忍,也不是怕人议论,而是怕鬼神记下账来,折了自家的福分。这类做法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凭个人自觉,无人发动,也无人摊派。要追问动力,就是出于对鬼神的信仰,希望能善有善报。

除了出资参加地方慈善事业,义庄另一主要任务是赡养族人。根据我祖父制定的规则,义庄除举办家塾教育族人学习识字、书写和计算以便谋生外,凡血缘关系近的族人家境贫寒者生病补贴医药费,死亡补贴丧葬费,娶媳嫁女也各有补贴。那时的人普遍迷